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总主编 杨玉芳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Nationality Psychology

民族心理学

(下册)

张积家 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总主编 杨玉芳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Nationality Psychology

民族心理学

(下册)

张积家 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心理学/张积家等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ISBN 978-7-5675-8734-2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民族心理学 IV. ①C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749 号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民族心理学

编 著 张积家等
策划编辑 彭呈军
特约编辑 罗雯瑶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陈军荣 倪志强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57.5
字 数 11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734-2/B·1163
定 价 186.00 元(上、下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独特的任务策略与之对应,语码切换实际上是任务策略转换。由于正在使用语言的任务策略处于激活状态,其他任务策略处于抑制状态。因此,在语码切换发生时,一方面需要抑制与当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匹配的任务策略,同时还需要将新的任务策略从抑制状态恢复到激活状态,当前使用的语言策略的持续激活和将要使用语言策略的持续抑制都会对切换发生产生一定的负启动效应,导致语码切换代价的产生。

以往对话码切换及其代价来源的考察主要围绕拼音文字的特定特征展开。由于采用的特定特征是基于不同语言的字母或字母组合,而且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正字法特征效应是基于特定语言的字母水平的。那么,当语言的特定特征具有语义信息时(如英文词的后缀“-man”、“-woman”等),这些特征是否影响语码切换及其代价?而且,以往研究主要以拼音文字之间的语码切换为主,对表意文字的语码切换关注较少。汉字是表意文字,以形声字为主体。形声字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构成。义符表义,音符表声。以往研究发现,义符作为汉字的结构特征,既可以对汉字词的类别语义提取起促进作用,如“姑”;也可以对汉字词的类别语义提取起干扰作用,如“婿”。因而,崔占玲和张积家(2010)以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为对象,考察汉—英双语者语码切换的机制及切换代价的来源。结果发现,有、无类别标记对汉字词或英文词加工都有显著影响,但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却不显著。这表明,在亚词汇水平上,特定语言的语义特征对话码切换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语码切换不是发生在心理词典内,而是发生在心理词典外,进一步证明了语码切换与任务转换的实质相同的观点。

崔占玲和张积家(2010)在研究基础上总结了语码切换代价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与两种语言表征的激活竞争有关。即某种语言的表征会对另一语言的加工具有抑制作用。在无切换系列中,被试的任务明确,只存在一种语言表征的激活;在切换系列中,由于非当前任务语言正处于激活状态,对当前任务语言表征的干扰会更强,从而延长了切换系列的反应时,表现出切换代价。(2)与对两种任务语言表征的抑制有关。这可以用抑制控制理论(the IC model)的两个假设来解释。假设1是激活后的抑制,即将要抑制的语言是与当前反应无关而且处于激活状态的语言;假设2是解除抑制需要额外的加工时间。而且,对某种语言的抑制会对在随后加工中激活该语言有影响。因此,从抑制后再激活的心理词典中检索出当前任务语言的信息会更加困难。由于任务语言的心理表征存在交替的激活与抑制,因此就产生语码切换代价。(3)与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有关。相对于不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的材料而言,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的材料的话码切换代价会更小。

无论如何,操纵特定语言的特征(包括正字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已经成为探究语

码切换代价来源的途径。通过操纵这些语言特征,观察它们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对揭示语码切换代价的来源大有裨益。沿袭这一思路,张积家和王悦(2012)认为,词汇水平的语码切换任务简单,对讲话者的语言能力要求较低。已有研究对“心理词典”往往也作了狭义的理解,多关注心理词典中词汇的词形、词义和发音的知识。事实上,心理词典还包含有词汇的语法知识和句法知识。如果将实验材料扩展到比词汇更大的语言单位(短语或句子),将研究焦点从“心理词典”扩展到“语言表征系统”,就更有利于确定语码切换代价的来源。

因此,张积家和王悦(2012)以熟练汉—英双语者为被试,采用命名图片的言语产生任务,考察汉、英空间方所短语(如“笼中鸟”/“bird in the cage”)表达差异和表量短语(“一头牛”/“a cow”;“一份报纸”/“a copy of newspaper”)对应水平上语码切换的机制及切换代价的来源。结果表明,汉语与英语表示空间方所的短语的差异和表示量的短语的对应与否影响语码切换过程,但对两种语言的切换代价影响不显著,表明语码切换代价未受特定语言的语法特征影响,支持熟练双语者的语码切换代价源于语言表征系统之外。此外,熟练汉—英双语者在短语水平上表现出典型的语码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切换至熟练语言的代价比切换至非熟练语言的代价大。该研究验证了三个假设:(1)验证了“语码切换代价与两种语言的语言表征的激活竞争有关”的假设。在无切换条件下,被试只需要激活一种语言的短语表征;在切换条件下,非当前任务语言正处于激活状态,会干扰当前任务语言的短语表征,反应时会变长,错误率也会增加。尽管汉语和英语的空间方所表达的差异十分明显,也无论汉语短语和英语短语的量的表达方式是否对应,被试在汉语命名和英语命名中均存在语码切换代价。(2)验证了“语码切换代价与对两种任务语言的语言表征的抑制有关”的假设。在切换条件下,即将要抑制的语言是与当前反应无关而且处于激活状态的语言,抑制该语言的短语表征需要额外时间;将要激活的语言在之前被抑制,解除抑制也同样需要额外的时间。无论是抑制过程还是解除抑制的过程,需要的时间都与讲话者的语言熟练程度有关。由于任务语言的短语表征存在着交替的激活与抑制,因此就导致了语码切换代价的产生。(3)验证了“语码切换代价来源于语言表征系统之外”的假设。因为切换代价无论是来源于语言表征的激活竞争还是来源于抑制控制,如果两种语言的语法特征有相似之处,两种语言的竞争就会减弱,对两种语言的抑制也会减弱,切换代价因此就会小。然而,研究结果却表明,在短语水平上,特定语言语法特征对语码切换代价没有显著影响。王悦和张积家(2013)以熟练汉—英双语者为被试,考察了在短语理解上语码切换机制及切换代价的来源。结果表明,汉语与英语在表量上的差异对语码切换代价影响不显著,语码切换代价不受特定语言的语法或句法特征影响;熟练汉—英双语者在短语水平上表现出语码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在言

语理解中,切换至非熟练语言的代价要大于切换至熟练语言的代价。

14.2.2 中—英双语者语义饱和效应研究

人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当长时间地注视某个词或大声地多次读一个词之后,会感到熟悉的词不熟悉了,甚至怀疑其拼写是否正确。但是,如果将视线移开,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那词,陌生感又消失了。不仅对语言材料可以发生这种现象,一张熟人的照片、一个熟悉的地点,看久了以后都可能觉得陌生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作 *Jamais Vu*(法语词,意为“旧事如新”),即见到熟悉的事物或文字时却一时什么都回忆不起来的感觉。随后,研究者采用客观方法研究,并将它定义为语义饱和效应(*semantic satiation effect*),即口头重复、长时间注视或重复书写某一单词,会导致该词的意义缺失或衰减。过度地暴露某一单词会出现短暂性的意义提取困难这一效应是否真的涉及词汇语义的丧失?它发生在词汇加工的哪一阶段?对这些问题,有三种不同看法:

(1) 语义加工阶段说。根据激活扩散模型(Collins & Loftus, 1975),概念以结点的形式表征,不同的结点之间相互连接形成网络。当启动词呈现时,对应的概念结点就被激活,激活通过内在的连接扩散到相连接的结点。如果一个概念结点经过饱和和处理后变得疲劳,疲劳就会传递给相连接的结点,使语义启动效应减弱甚至反转(Smith, 1984; Pynte, 1991),此时就会产生饱和效应。

(2) 知觉加工衰减说。语义饱和效应只是由于个体对刺激的知觉表征衰退的缘故,或者是由于前语义适应的缘故,即前语义信息(听觉信息或视觉信息)随着刺激的重复呈现而衰减,导致输入到语义分析层的信息被衰减了。Frenck-Mestre 和 Pynte (1997)未发现 N400 振幅差异随着饱和和处理逐渐减小,即饱和效应与语义加工无关。

(3) 知觉表征—语义联接阶段假说。语义饱和效应既不是发生在知觉加工阶段,也不是发生在语义加工阶段,而是发生在知觉表征和语义加工的联接阶段,是一种“联接饱和”。Tian 和 Huber(2013)使用脑磁图和动态因果模型研究发现,视觉词形区(负责词形加工)与左侧颞中回(负责语义加工)的神经联接随着饱和和处理而减弱。

对语义饱和效应的探讨多数基于母语加工,甚少关注第二语言加工。语义饱和效应是否为母语阅读所独有?张积家、刘翔和王悦(2014)提出,在研究语义饱和效应的经典范式中,启动词(类别词)和目标词(样例词)属于同一语言,阅读者在语言内会体验到语义缺失,若启动词和目标词属于不同语言,双语者是否会出现语言间的语义饱和效应?如果启动词属于一种语言,目标词属于另一种语言,在对启动词饱和和处理后,如果引起对目标词加工困难,就说明在语言间也存在语义饱和现象,证明饱和效

应发生在语义加工阶段;如果对启动词的饱和处理未影响目标词加工,就说明饱和效应发生在知觉加工和语义加工的联接阶段,因为启动词和目标词分别属于不同语言,它们虽然有语义关联却有不同的词形。

他们采用语义启动范式和类别判断任务发现,汉一英双语者在母语语义加工中表现出稳定的饱和效应,在第二语言语义加工中未出现语义饱和效应。先呈现第一语言的启动词,在多次重复后,语义结点达到饱和状态,如果继续呈现第一语言的目标词,会影响其意义通达;呈现第二语言的目标词,不会影响其意义通达。即,由第一语言词汇一概念通道引起的语义结点疲劳,不仅不会扩散至第二语言的词汇一概念通道,反而有促进第二语言词汇加工的作用。先呈现第二语言的启动词,在多次重复后,语义结点将持续保持激活状态,相当于语义充实过程,继续呈现第二语言的目标词,会促进其意义通达;若呈现第一语言的目标词,对熟练双语者影响甚小,对不熟练双语者会表现出促进其意义通达的效果。

汉一英双语者的语义饱和效应的模式对语义饱和效应的发生阶段具有重要启示。它表明,语义饱和效应既未发生在词形加工阶段,也未发生在语义加工阶段,而是发生在字形和语义联接的阶段。因为汉一英双语者在第一语言之内出现稳定的语义饱和效应,而在第二语言之内并未出现语义饱和效应,这是由于第二语言的词形与语义的联结较弱;在跨语言情境下亦未出现语义饱和效应,这是因为一种语言词汇的语义结点达到饱和状态,并未影响其他语言的词汇结点的语义通达。当一种语言的启动词的词形到共同语义的通路被多次使用后,出现了疲劳,而另一语言的词形到语义的通路却未被使用,当这种语言的目标词出现时,由于其词形到语义的联结通路未被使用,就不会出现疲劳,饱和效应也就无从产生。

14.2.3 双语心理词典研究的新进展

基于词形层面的研究

语言在表达意义时具有任意性。同一概念可以由不同符号系统来表达。然而,就某些语言而言,它们使用的一些符号具有共同来源。例如,许多英语词和法语词都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对特定的两种语言而言,同源词(cognate words)是指由于具有共同来源而在词形上或语音上重叠水平较高的翻译对等词,非同源词(non-cognate words)是指由于不具有共同来源而在词形上或语音上重叠水平较低的翻译对等词(Voga & Grainge, 2007)。因此,在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大小的差异。语言相似性因而成为影响语义表征的重要因素。

汉语词和日语词往往具有共同来源,许多词汇的词形相同或相似。中一日同形词(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是指汉语和日语的翻译对等词由于历史原因拥有

共同词根而在词形上具有高水平重叠。这些词包括：(1)书写结构与汉字相同或者只有很小的差别；(2)属于未简化的汉字(如“評論”、“饅頭”)；(3)在汉语中没有，却可以引起联想的词(如“価格”、“弁当”)(曹珺红,2005)。因此,当汉语和日语的翻译对等词在词形上较少重叠时,就被称为中-日非同形词(Chinese-Japanese non-homographs)。这些词的结构与汉字词之间差别较大,如“あに”(哥哥)、“パン”(面包)。王悦和张积家(2014)采用不熟练中-日双语者,以中文与日文同形词和非同形词为材料,考察翻译方向、词汇拼写形式和加工任务对隐蔽翻译启动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词汇拼写形式对不熟练中-日双语者两种语言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即表现出拼写形式依赖效应。加工任务对隐蔽翻译启动效应也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同字词拼写特征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当中文词和日文词同形时,中文词启动日文词和日文词启动中文词出现对称的启动效应;当中文词和日文词不同形时,中文词启动日文词和日文词启动中文词出现不对称的启动效应。这种不对称性与加工任务有关:在词汇决定任务中,中文词对日文词的启动效应显著大于日文词对中文词的启动效应;在语义决定任务中,两个方向的启动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因素使得不熟练中-日双语者对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的反应不尽相同。同形词具有加工优势,但这种优势受任务类型影响。综合来看,不熟练中-日双语者的语言表征既不完全地符合概念中介模型,也不单纯地符合修正的层级模型,而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对中-日同形词而言(如图14-7a所示),由于词形结构相同或相似,语义表征共享,词形相同或词形之间具有较高水平的重叠,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可以相互激活,同时中、日同形词各自也都可以直接通达共享的概念系统,因而出现对称的启动效应。对中-日非同形词而言(如图14-7b所示),信息激活的途径会依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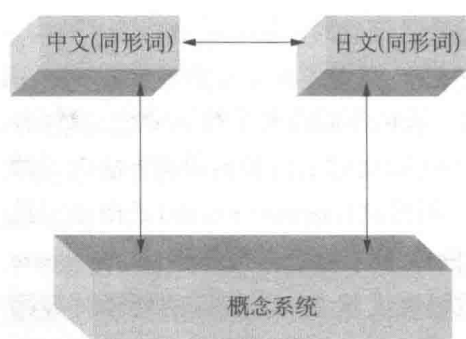


图14-7a 中-日不熟练双语者同形词对的表征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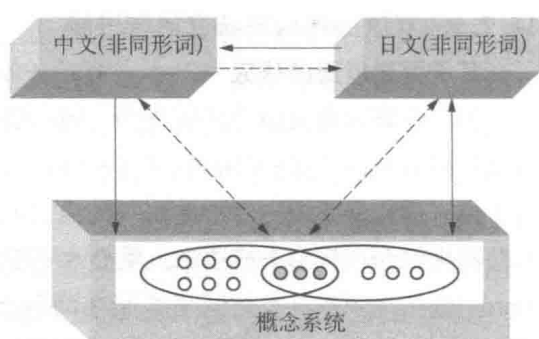


图14-7b 中-日不熟练双语者非同形词对的表征模型

注: \longleftrightarrow 表示语义卷入程度浅时的激活路径
 \longleftarrow 表示语义卷入程度深时的激活路径

任务要求不同(语义卷入程度不同)而不同。词汇决定使被试重视词形的作用,语义分类任务更突显语义的作用,因而前者符合修正层级模型的预测,后者倾向于意义模型的观点。总之,鉴于不同任务的语义卷入程度不同,被试会灵活地采取相应的反应方式。

基于语义层面的研究

在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汇是多义的或者是歧义的(polysemy or ambiguous),即在一种语言里的词汇具有多个不同含义,这些含义又对应于不同的翻译对等词(例如,英文中“bank”的两个含义分别对应于中文中的“银行”和“河岸”)。即使当一个词只对应于一个翻译对等词时,它们之间的含义也并非一一对应。研究者发现,双语者加工非翻译歧义词对(translation-unambiguous pairs)显著快于加工翻译歧义词对(translation-unambiguous pairs)。而且,随着双语者的第二语言(L2)熟练程度提高,翻译歧义词对反应慢的趋势就更加明显。Laxén 和 Lavour(2010)运用分布式概念表征模型(the distributed conceptual feature model,简称 DCFM)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该模型认为,对特定语言中的多义词而言,当翻译对等词不止一个时,其不同意义是以相同方式被激活。因此,主要翻译对等词在翻译中会优先地得到激活,因为它们与目标词共享的结点比次要翻译对等词要多。

迄今为止,关于语言间的多义词认知的结论都基于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未涉及表意文字。拼音文字之间存在同源关系,两种语言之间差异相对较小。例如,对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而言,两种语言中多义词的词形相似、义项数相近,有时甚至是同源词。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多义词却相差甚远,两种文字系统的多义词在词形、词义和句法上差异较大。为了检验基于拼音文字研究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以及句法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双语者语言的加工,王悦和张积家(2013)以中、英文的多义词为材料,采用跨语言隐蔽启动范式,考察在无语境条件下熟练中—英双语者对多义词的早期识别。结果表明,熟练中—英双语者表现出显著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当目标词是主要翻译对等词时,启动效应更显著。翻译对等词的性质、多义词的义项联系程度以及是否是词类歧义词都影响熟练中—英双语者对中、英多义词的早期加工。更为重要的是,在无语境条件下,词类信息在意义通达早期就已经激活,并且同语义信息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结合 DCFM 模型关于翻译歧义现象的解释,王悦等人将 DCFM 模型扩展到语法层面,使之能够描绘语法层面和词汇层面的交互作用。图 14-8 和图 14-9 描绘了非词类歧义词在义项联系紧密和义项联系松散时的情况。多义词及其翻译对等词属于同一词类,共享词性结点。例如,“先生”与它的英语翻译对等词“sir”与“husband”都是名词,在词序、用法以及句子中的成分基本相同。无论是语义联系紧密还是语义联系松散,非词类歧义词的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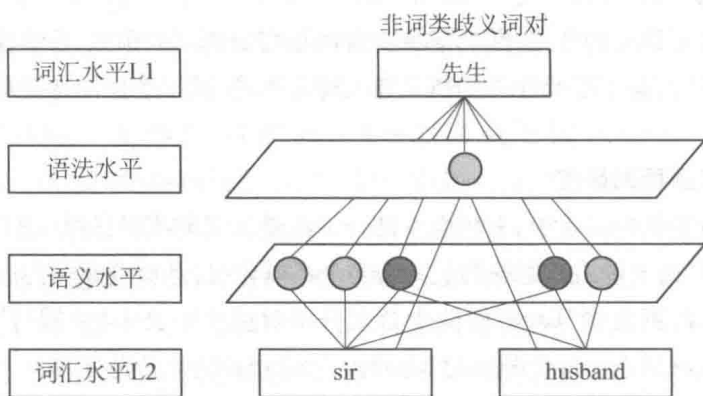


图 14-8 义项联系紧密时非词类歧义词对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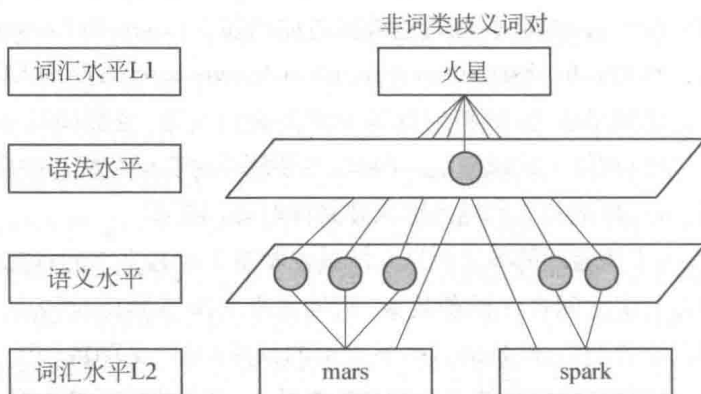


图 14-9 义项联系松散时非词类歧义词对的表征

信息和词汇信息均被平行地激活,两者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因而,语义联系效应得以完全地实现。

图 14-10 和图 14-11 描绘了词类歧义词在义项联系紧密和义项联系松散时的情况。多义词及其翻译对等词不属于同一词类,每个翻译对等词与目标词共享一定的句法结点,但二者之间没有共享的句法结点。例如,“进口”与它的英语翻译对等词“entrance”和“import”。一般来说,“entrance”的词性为名词,在句子中充当主语或宾语;“import”的词性为动词,在句子中一般作谓语。句法表征的重叠水平低,导致句法层面的激活竞争强,而且参与到语义信息的竞争之中。词类歧义词的语法信息和词汇信息相互影响,使得语义联系紧密时,激活竞争更大,出现语义干扰效应。

修正的层级模型认为,双语者的第一、二语言相互独立,两种语言共享一个语义记忆。然而,O'Gorman(1996)采用词汇联想任务,让香港成人英语学习者先听一个英语词或汉语词,然后写出最先想到的一个词。结果表明,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存储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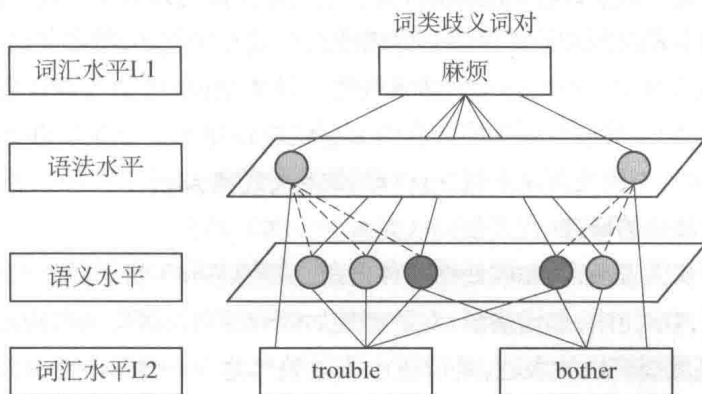


图 14-10 义项联系紧密时词类歧义词对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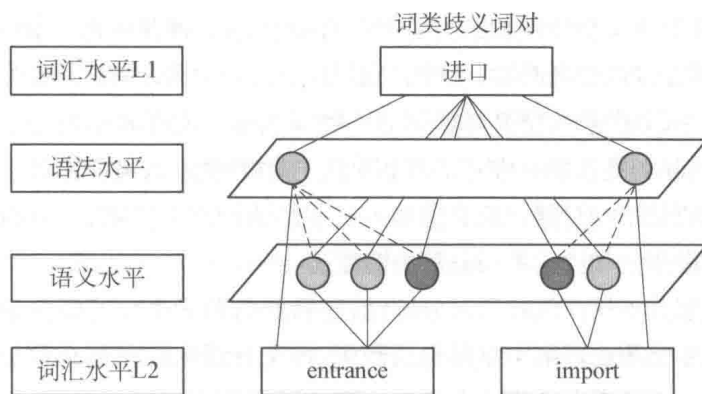


图 14-11 义项联系松散时词类歧义词对的表征

提取系统。就词汇之间的概念联系而言,分类学联系和主题关联联系是人们研究最为深入的两种类型。

分类学联系概念是指基于概念成员间相似性而形成层次性表征的概念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水平概念(如“桌子”、“猪”和“鹦鹉”等),其语言形式简单,比起其他层次上的概念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分类学联系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典型性,高典型的概念容易提取,容易判断其所属类别。主题关联联系是事物在空间、功能等方面互补的显而易见的联系。一个事物能够迅速引起对之有主题关联联系的另一个事物的联想。在人的概念组织中,多种联系并存。受年龄、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人群而言,不同类型的概念联系的相对重要性有异。分类学联系的发展受教育的影响极大,而主题关联联系的发展则主要基于人的生活经历。由此,不难提出一个问题,双语者在一种语言形式下对不同类型概念联系与另一种语言形式下的情形相同吗?李德高、李俊敏和袁登伟(2010)以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大学生为对象,通过控制

主题关联和分类学联系,使用记忆和自由回忆任务及迫选判断任务,发现虽然在汉语条件下被试对主题关联和分类学联系的敏感性程度不相上下,但在英语条件下,他们对分类学联系的意识相对主题关联联系较强。具体地说,对第二语言能力较低的双语者来说,修正的层级模型所指的共享语义记忆应该是类似分类学联系概念的普遍性知识,难以囊括主题关联联系概念这样的文化专门性知识。

基于固定表达的研究

对中一英双语者而言,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在更高级别的语言单位中,如惯用语,双语者是如何理解两种语言中的固定表达? 惯用语(idiom)是高度惯例性的表达,是口语中表达整体意义的短小定型的惯用语,通常以三字格为主,如“背黑锅”、“出风头”等。

惯用语的比喻义不能由对词素的句法加工和语义分析获得。非建构的观点认为,惯用语是具有语义整体性和结构稳定性的固定词组,通常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运用,是一种无理据的死隐喻。建构的观点认为,惯用语理解是主动的认知建构过程。在理解中,成分词素的意义对整词的比喻义的通达发挥着重要作用。语义分解性(decomposability)是否影响惯用语理解是区分两类观点的重要指标。语义分解性是指惯用语的成分单词对整词意义理解的贡献。依据有无贡献,可以将惯用语分为语义可分解的惯用语和语义不可分解的惯用语。

惯用语理解并不仅仅依赖语义分解性,还需要借助于个体的概念系统和百科知识。文化知识在惯用语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语义分解性的作用必然受个体的文化知识制约。母语讲话者会利用已有概念原型和百科知识来理解惯用语,致使语义分解性在惯用语理解中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孙尔鸿、马利军、张积家和杜凯(2014)认为,以往研究常局限于一种语言之内,由于语言受文化影响,文化知识会影响语义分解性的作用。因此,他们通过考察不同语言的惯用语理解,分离知识经验的影响,证实语义分解性的真实性,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提供证据。通过操纵熟悉性和语义可分解性,他们考察了中一英双语者对汉语惯用语和英语惯用语的理解。结果发现,语义分解性影响中一英双语者对汉语惯用语和英语惯用语的理解,语义可分解的惯用语的理解速度快,错误率低。语义可分解型惯用语,字面义对整词意义的贡献大,两者之间语义距离近,加工所需要的认知努力少。语义不可分解型惯用语,字面义与比喻义无关,对字面义的理解无助于比喻义的通达,两者之间的语义距离远,加工需要的认知资源多。此外,个体对语义不可分解的惯用语的理解更加依赖于文化知识。惯用语的理解和使用由概念知识驱动。对不同语言的不熟悉的惯用语,被试对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成绩较好,对逐字翻译的英语惯用语的理解成绩较差。这表明,语言使用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会对惯用语理解产生重要作用。同时,相对于语义

可分解的惯用语,语义不可分解的惯用语常是具体生活事件的抽象化,惯用语的特异化程度高,而且主要体现在惯用语的外部表现形式——词汇表征上。因此,文化知识的作用主要影响对语义不可分解型惯用语的理解。

14.2.4 双语经验对其他认知能力的影响

在众多的双语研究中,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探讨双语对认知的影响。例如,双语者进行某一语言活动时是否需要抑制另一语言,双语儿童是否比单语儿童有更加出色的元语言认知,双语者与单语者在中央执行功能上是否有差异,等等。从以往研究看,双语(包括多语)学习经验对认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双语掌握过程对某些认知过程存在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双语经验对一些重要认知功能存在积极影响。

双语对场景认知的影响

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设认为,语言影响认知并在颜色分类、空间推理、时间比较等领域发现了反对普遍理论的证据。场景知觉是检验文化效应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西方人关注前景,善于分析物体的特性,倾向于将物体归入类别;东方人关注背景,善于整体思维,并基于关系和相似性作出判断(Nisbett & Miyamoto, 2005; Chua, Boland & Nisbett, 2005)。使用不同的语言,人类的认知加工会出现分化。

汉语词与英语词在外形特征、区别性特征及符号记录语言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在不同语言词汇引导下,双语者的场景知觉是否存在差异?眼动是研究阅读场景知觉及视觉搜索等信息加工的良好手段和研究范式。王娟、张积家、刘鸣和印丛(2011)以汉一英双语者为被试,探讨他们在喜欢度评定任务中汉语词和英语词引导下的场景知觉,记录被试在注视场景图片时的眼动轨迹。实验逻辑是:如果汉一英双语者在汉语词和英语词引导下产生了不同的场景知觉,那么,文化效应至少可以部分地归结为语言的作用;如果汉一英双语者在汉语词和英语词引导下的场景知觉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文化对场景知觉的影响即使存在也只能归结为其他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在英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图片的总注视次数、对背景区的注视次数显著多,对背景区的注视时间显著长;在汉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前景区的注视次数显著多,对前景区的注视时长以及平均注视时间显著长。研究表明,语言对场景知觉有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1)尽管汉语和英语的短语表达方式存在差异,但不影响言语理解,被试对场景图片的加工都体现为优先关注前景。汉语和英语是不同语言。从认知角度看,二者的语序安排各有侧重。汉语遵循“自然语序”(即“时间顺序”)原则,即按照人如何感知时间顺序中的情状安排语序;英语遵循“焦点凸显”原则,即按

照说话者的兴趣与表达焦点安排语序(徐行言,2004)。虽然从言语表达上看汉语和英语大相径庭,但从言语理解角度看,二者却殊途同归,都强调短语中前景物体的重要性,因而前景物体都获得了优先关注。(2)汉语和英语的语言特性差异影响加工重心选择。(3)汉语短式短语和长式短语的差异影响加工资源分配。与汉语短式短语比,汉语长式短语的信息复杂度增加,意义表达更明确,句式变化导致理解重心前移,被试会抽取部分资源用于背景加工,极大地削弱了对前景的加工力度,对前景不一致场景的加工速度就显著变慢。(4)语言熟练程度影响被试的整合加工能力。

在场景知觉中,除了启动语言类型会影响被试的眼动轨迹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任务加工深度。喜欢度评定任务会引导被试关注图片场景中感兴趣的区域或目标,图文一致性判断会引导被试对图片进行精确的意义加工。因此,任务加工深度不同,眼动特点也存在差异。为了明确这一因素的影响,王娟和张积家(2014)要求汉—英双语者判断启动短语与图片场景的一致性。研究发现,启动语言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1)无论是英语短语启动,还是汉语短语启动,前景物体均更多更早地获得关注,这与英语短语和汉语短语的所指相同有关。(2)语言特性影响被试的眼动轨迹:在英语短语启动下,背景信息后置引导被试对背景进行了额外的、快速的关注;在汉语短语启动下,被试的注视由前景区转至背景区的时间较晚且注视比例较小。(3)任务加工深度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

近年来,在场景知觉研究领域,也有研究者对文化效应提出了质疑。Rayner, Li, Williams, Cave 和 Well(2007)通过阅读、脸孔加工、场景知觉等 6 种任务,发现美国被试与中国被试注视背景和前景的平均时长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文化对场景知觉的影响没有那么强烈,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眼动差异应该更多地归结为语言经验的作用,而非文化效应。Evans, Rotello, Li 和 Rayner(2009)重复了 Chua 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美国人与中国人对前景的注视均多于对背景的注视,对前景的注视时间均长于对背景的注视时间。两种文化的个体在场景知觉和记忆中使用的策略也相同。Rayner, Castelhana 和 Yang(2009)要求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注视特异的场景,发现在各项眼动指标上,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均未产生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场景知觉的文化差异仍然存在着争议。

对时间认知的影响

在探知世界进程中,当遇到抽象或难以言表的概念、观点或体验时,人们往往借助熟悉概念来描述新的事物。这种把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范畴的概念映射到抽象概念的隐喻性表征,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础之一。时间的抽象性决定了它要通过隐喻方式被人理解,而空间概念是人们在理解和感知时间时最常用的,这就是时间的空间隐喻。研究者通过对英语、汉语、印度语和塞索托语分析后发现,人类的时间经

验源于对空间的体验。

尽管在不同语言中都存在时间的空间隐喻,但在借用空间词汇来表达时间时还存在差异。例如,在英语中,时间多用“前”(ahead of)、“后”(behind)等空间术语,即人们把时间发生的时间顺序看作是一条水平直线上的空间关系。在汉语中,除了常见的“前”、“后”隐喻之外还经常对时间作竖直方向的隐喻,如“上个月/下个月”。Boroditsky(2000,2010)发现,汉、英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导致不同空间关系对时间的启动有不同。对英语母语者而言,由于经常对时间作水平方向的隐喻,所以水平启动的效果大于竖直启动;对汉语母语者而言,由于经常作竖直方向的隐喻,所以竖直的启动效果大于水平启动。刘丽虹和张积家(2009)沿袭 Boroditsky(2000)的实验范式,发现即使是英语较为熟练的汉一英双语者,仍然表现出较强的汉语表示时间的特性,即水平和竖直两种空间关系都对汉语被试有促进作用,但竖直空间关系的促进效果更强。用汉、英两种实验材料得出的结果相同。据此,他们认为,汉语母语者更倾向于对时间作竖直方向的隐喻,人们对时间加工受到本民族语言对事物规定特性的限制。不同民族的祖先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创建了不同语言,语言一旦产生,就会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他们在认知过程和心理特点上和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语言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形成的基础。

对中央执行功能的影响

中央执行功能主要包括同时协调不同任务的操作,变换操作策略,抑制与当前操作无关的信息,在长时记忆里保持信息和对信息进行操作处理等。很多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在中央调控的多个子功能上表现出促进作用。

大量研究发现,双语者比单语者在中央执行功能上有更出色的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Luo, Luk 和 Bialystok(2010)要求 6 岁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完成总体一局部测试(global-local test)。在这个测试中,刺激物为局部特征和总体特征可变化的视觉刺激,如一个由小字母 a 构成的大字母 F,被试根据指导语对总体特征或局部特征反应。在控制语言能力和短时记忆能力基础上,双语儿童表现出更快的处理冲突信息、抑制与任务无关的干扰信息的能力。

双语对中央执行功能的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变换操作策略和注意分配上。例如,对大学生研究发现,双语者比单语者能更有效地在心理操作上进行任务转换(task switching)(Prior & MacWhinney, 2010)。

双语者的中央执行优势还体现在工作记忆的容量上。工作记忆容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执行功能对记忆材料所使用的组织策略,适当组织可以扩大工作记忆的容量。因此,双语者优越的中央执行功能有助于他们使用合适的组织策略,从而获得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例如,数字长度记忆能力相当的双语者和单语者被要求按

照指示的顺序去记忆一组随机方式呈现的物体的空间位置,双语者表现出更优秀的正确回忆成绩,说明在工作记忆容量相等的情况下,双语者比单语者更善于组织刺激材料。此外,双语对中央执行的影响始于儿童早期,这一影响在高龄被试上同样具有优势。

对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力是成功完成某种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心理品质。双语与创造力的关系如何?早在20世纪初,人们认为双语对儿童的智力发展具有消极作用:双语儿童经常用一种语言思考而说另一种语言,在心理上会变得不确定和混乱,甚至迟钝。但是,也有相反的意见。双语儿童的思考结构比较复杂,能够刺激儿童的思考能力高度发展。双语儿童在流畅性、独创性和精致性上胜过单语儿童。双语水平对发散思维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显示,两者具有正相关。倪传斌(2012)梳理了影响双语者创造力的因素,包括二语水平、习得二语的年龄、二语的接触量、教学内容和个体特征等。研究发现,二语水平是影响双语者的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高水平双语者在思维流畅性、想象力和语言流畅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单语者和低水平的双语者。双语者的二语水平越高,创造力就越强。习得二语年龄早的双语者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上比二语习得晚的双语者和单语者强。旅居海外的时间与创造力明显相关。旅居海外的时间越长,创造力的得分越高,主要表现在灵活性更好、理解内在关联和克服功能固着的能力更强,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多。在教学内容方面,将文化进行对比的教学内容可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这种提升具有延时效应。多元文化的经历、心理开放性与创造力存在明显相关。心理开放性越优秀的被试如果接触多元文化的经历越丰富,创造力得分就越高。在个性方面,研究发现,个性封闭的被试,创造力就低。因此,开朗的个体可以通过增加二语接触量来提升创造力。张晖和张积家(2011)采用创造力态度量表考察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生的创造力态度及其发展,发现英语专业学生在创造力态度总分以及在“对自己观念的信心”、“对于新奇的欢欣”、“理论和审美倾向”、“对刺激性表达的接受”、“向往新颖与奇迹”等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英语专业学生,这种差距有随着年级增加而扩大的趋势,表明双语水平和双语经验对大学生的创造力态度具有重要影响。

14.3 民族语言—汉语—英语三语者语言心理研究

目前,双语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掌握三种语言的三语者研究还相对较少。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在56个民族中,29个民族仍然使用与本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文字。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有不同的认知过程。我国少数民族学生

在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一般还学习汉语(L2)和英语(L3),他们都是三语者。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我国少数民族三语者的语言认知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三种语言的一般顺序是:本民族语言是母语(L1),从出生时起,个体就生活在母语氛围中;汉语是第二语言(L2),从幼儿园或小学开始接触汉语,小学阶段普遍用双语教学(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方式授课,汉语学习的媒介语是民族语言;第三语言是英语(L3),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英语学习的媒介语是汉语。三语者在语言的获得与使用上与双语者不仅存在量的差异,也存在质的差异(崔占玲,王德强,2012)。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或三语的认知特点如何?自21世纪初开始,研究者围绕少数民族三语者的语言心理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最初关注少数民族双语者的心理词典是独立存储还是共同存储。近年来,关注少数民族学生不同语言的表征和联系方式。

14.3.1 少数民族三语者的语言表征和联系方式

对母语为蒙古语的三语者的研究

蒙古语是古老的民族语言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属于黏着语(如图14-12)。蒙古语有严格的元音和谐律;在形态学方面以词根或词干为基础,后接附加成分派生新词和进行词形变化;句子中的语序有一定规律。通常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谓语在宾语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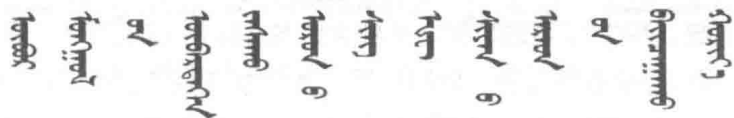


图14-12 蒙古文范例(图片来源:网络)

白乙拉和李慧惠(2006)采用语义启动词汇判断范式,考察同一语言内和不同语言间的语义启动效应。结果发现,英语熟练程度不同的蒙—汉—英三语者存在英语语言内启动效应。而且,蒙—英以及汉—英之间存在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他们还发现了跨语言启动的不对称性,蒙—英以及汉—英的启动量显著大于英—汉以及英—蒙的启动量。这些语言间启动效应证实了蒙—汉—英三语者三种语言的语义是共同存储的。李杰、侯友、王凤梅和姜淞秀(2013)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非熟练蒙—英双语者的词汇与概念表征的特点。被试需要完成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的不同任务。在学习阶段,被试完成语义判断任务,目的是让目标语言的词汇通达共同语义表征;在测验阶段,被试完成真假字词判断任务,目的是考察学习阶段所呈现的语言的词汇在语义通达中激活了哪些语言的词汇表征。如果学习阶段的语义通达